

2801

西安文史資料

第七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
西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目 录

难忘的教诲

- 记两次聆听毛主席的讲话 黄玉龙 (1)

抗战胜利的信息

- 回忆周副主席一九四〇年在西安南

- 郊宋家花园的一次时事报告 赵全璧 (5)

- 朱德同志在西安“八办” 谭 冰 (8)

党在一战时期的军事工作片断

- 记马云泽同志的一次谈话 郭润宇 (11)

- 胡景翼将军年谱** 黄花岗辑 (19)

平甘、援陕、联晋、图豫——冯玉祥将军五原

- 誓师后战略方针的得失 韩俊生 (41)

- 冯玉祥驻潼关时的政绩 徐文华 (57)

- 冯玉祥在西安的二三事 尚者炎 (61)

- 冯玉祥在四川的“献金救国”活动 康问之 (64)

- 我在西北军中的一段回忆 卢云九 (71)

- 国民党战干四团概要 杨维泉 (85)

- 我所知道的国民党西北青年劳动营 左庆丰 (93)

- 蓝姆咖受训见闻 胡汉文 (109)

滇、緬忆事	黎成德 (115)
解放前西安东关的中小学教育	黄云兴 (142)
三十年代初陕北防治鼠疫亲历记	刘志贤 (150)
我从事痔漏医疗五十年	王芳林 (154)

陕西省企业公司的兴衰十年	肖之仪 (159)
回忆“积义兴银号”	窦荫三 贺志云 (178)
怀念韩望尘先生	贺志云 (186)

广仁寺	康寄遥遗稿 (194)
西安南院及南院门	田克恭 (204)
“公益书局”	田克恭 (213)

质疑·匡正

大革命时徐九龄、方鉴昭二烈士的革命

活动梗概	悟 晚 (215)
文史资料贵在真实	胡景儒 (219)
文史资料一定要如实记述	周庆霖 (220)
史实必须准确	刘蕙芳 (221)
郑重声明	李志清 (222)

· 文史小品 ·

辇止坡老童家腊羊肉	张 朋 (18)
老韩家汤元	晋震梵 (114)
国民党军统局“擒虎纵虎”	冯美铨 (185)

难忘的教诲

记两次聆听毛主席的讲话

黄 玉 龙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党中央和毛主席率领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与我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吴起镇一仗，消灭尾追红军的国民党东北军一个骑兵团，击溃三个团。这是中央红军长征割尾巴的一仗。

毛主席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的喜讯，迅速地传遍边区的村寨，边区军民纷纷议论，沉浸在欢乐之中。

十一月二十日那天，天上飞着鹅毛大雪，纷纷扬扬地下个不停。这是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亲自部署直罗战役的前夕。当时我在红十五军团八十一师二团四营二连任班长。我们排急行军来到富县阳泉镇一家老乡的大院里，排长文斗同志站在队伍前严肃而又带点兴奋的表情说：“今天有中央首长来这里休息、吃晚饭。二班、三班搬到连部大院。一班的任务是：打扫好卫生，整理内务。注意军风纪。准备开水和洗脸水。加强警卫工作”。当听说中央首长要来，又把这项任务交给了我们一班，都

感到十分光荣，大家立即行动起来。战士们互相猜测是不是毛主席来了？上个月吴起战斗后，大家都知道毛主席经过长征到了陕北。这时，从门外进来几个同志，其中一个看了看房子后，作了如下的安排：“一号、二号首长到正房休息。三号、四号首长在东房休息。警卫班在西房”。过了一会儿，进来几个身着军装的人，走在最前面的那个人个子很高，头戴五星八角帽，身穿灰布军装，打着裹腿，穿着草鞋，精神奕奕，目光深邃，表情和蔼慈祥。后面紧跟着的那一位留着胡须，眉毛浓黑，面带微笑，他们俩位一路说着话进了正房。另外的那两位进了东面的房间。战士们十有八九的都猜到了进正房的是毛主席、周副主席，进东房的是彭德怀司令员和叶剑英参谋长。

我怀着欣喜的心情端着洗脸水送进正房，并说：“请首长洗脸！”周副主席说：“主席先洗吧！”主席说：“我们一块洗吧，这个地方在塬上，缺水。老百姓夏天吃雨水，冬天吃雪水，很困难哪！”主席转身向刚从门外走进来的一个警卫员说：“告诉警卫班的同志们，大家合用洗脸水，不要浪费”。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聆听到毛主席的教诲，心里激动不已。毛主席是伟大的人民领袖，连用一盆洗脸水，都想到群众的疾苦，惦记着陕北高塬上吃水困难的事。主席这些话直到现在，使我难以忘怀。

洗完脸，我又送开水进去，腼腆地说：“请首长喝水吧！这里水不好，浑浊得很，都是雪水”。主席端着缸子笑了笑说：“没得关系，老百姓能喝，我们就能喝。我们是人民的儿子，不是人民的老爷嘛！”周副主席关怀地问我：“小同志，今年多大了？”我说：“十八岁了”。他又问：“家是那里人？”我说：“陕北清涧县人”。又问：“什么时候参加红军？入党了没

有？”我都一一作了回答。毛主席接着对我说：“小同志，你是陕北红军，是刘志丹同志的红小鬼”。我回答说：“首长，刘志丹被二十五军关起来了，说什么刘志丹是AB团，我们不知道什么是AB团，只知道刘志丹同志是为受苦人民闹革命的”。这时周副主席插话说：“刘志丹是个好同志。好人总是好人，问题一定会搞清楚的”。毛主席接着说：“直罗镇这一仗打完了，我们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周副主席接着问我：“小同志，你家里老人都好吗？你为什么当红军？当红军苦不苦？”我如实回答了周副主席的询问，并说：“我父母亲都是受苦人，母亲生下我四十天就死了，我是大姑和老祖母带大的。从小放羊、种地。十六岁参加革命，十七岁参加红军，为贫苦人民打仗，为了过上好日子，苦怕什么”。毛主席听后说：“你是一个苦娃娃，是个好娃娃”。周副主席也接着说：“苦水里生，苦水里长的孩子，革命意志就更坚决嘛！”又问：“你上过学没有？”我说：“没有”。毛主席、周副主席都说：“一定要好好学习文化，要当好一名革命战士”。我见这时两位首长只顾说话，端去的开水已经凉了，遂转身出去换了开水又送进房里。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周副主席时的情景。

一九三九年，我在中央军委总政保卫部举办的第二期除奸训练班学习时，开学典礼大会上，我又一次见到了毛主席。由于当时环境更为艰苦，主席显得有些清瘦，穿着一件宽大的灰布军衣，膝盖上还补了两块补丁，脚上穿着边区人民慰劳的粗布鞋。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毛主席走上主席台，向我们作了讲话。鼓励每个保卫干部，在保卫党，保卫枪杆子，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人民方面，要向老农一样辛勤劳动，爱护来之不易的胜利成

果。

在那艰苦的年代，我两次见到毛主席，聆听他的教诲，这在我生命史上是一页重要的篇章，是我不断前进的力量源泉，我将永远地铭刻在心底。

抗战胜利的信息

回忆周副主席一九四〇年在 西安宋家花园的一次时事报告

赵全璧

一九四〇年春天，日本帝国主义者调动各战场主力军队，向西北发动总攻，一批日本侵略军逼近潼关，并每天派数十架飞机不分昼夜对西安及各大城市狂轰滥炸。南京国民党政府不但不动员军民坚决抵抗，反而由交通部密令各邮电部门准备向汉中撤退，并令将重要档案及邮电器材先转移到近郊安全地带。陕西邮政管理局奉令后，在南郊宋家花园（西安著名人士宋联奎的别墅）成立了临时办公处，将指挥全省邮政的业务、财务等部门及负责西北军邮业务的晋陕军邮总视察段办公处均迁到园内。同时西安电信局还在杜公祠设立了战备物资仓库，以避免轰炸。陕西邮管局局长西密司（F.L.Smieh）及军邮总视察林卓午也在那里办公。

日寇虽逼近潼关，但由于八路军在太行、中条山区开展敌后游击战，给日军以严重打击，牵制日军不敢贸然渡河西进。当时在山西负责战场军邮业务的总视察林卓午与游击区保持着紧密的

联系，使黄河东岸广大地区的军邮得以保持畅通。

是年秋天，林卓午由晋西北来西安汇报工作，应职工的要求，邀请在西安的周恩来副主席为邮政职工作了一次时事讲话。为避免敌机轰炸，保证周副主席的安全，决定报告会在宋家花园办公处举行，得到了周副主席的允许。

九月初一，天气晴朗，早晨林卓午即从城里给住在宋家花园的西密司来电话说：“周恩来先生决定上午十时到宋家花园来，希通知全体职工作好准备”。喜讯传来，大家奔走相告，整个办事处沸腾起来了，西密司以及全体职工带着崇敬的心情到宋氏祠堂西院柳树下集合排队，等待着周副主席的光临。

幸福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九点五十分，一辆黑色福特小座车开进了宋家花园，汽车门开启后，周副主席在林卓午陪同下，直接来到西偏院，职工们以热烈的掌声表示热烈的欢迎。

周副主席身穿银灰色平布军服，头上戴着缀有闪闪发光五角星的八角军帽，腰间系着一寸宽的皮带，目光炯炯，精神抖擞地走到柳荫下早已摆好的桌旁，经林卓午介绍后，会场上又一次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周副主席微笑着向大家问好后，开始了他的时事报告。他详细分析了各个战场敌我作战情况和游击战取得的辉煌胜利。他说，敌后的人民武装，牵制着几十万日寇和伪军，敌人已无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目前只能作垂死的挣扎，等待末日的来临。他说，我们打的是民族自卫战，是正义的战争，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只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枪口对外，作好长期抗战的准备，抗日战争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周副主席的讲话，给我们带来了抗日战争胜利的信息，使职

工们对当时各个战场的有利形势有了明确的了解，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消除了很多人的悲观失望情绪。好像一轮太阳升起，冲散了满天乌云，晴空万里，胜利的曙光照到了人的心里。

周副主席的讲话，历时整整两个小时，才在一片掌声中结束。会后，西密司设午宴招待周副主席，由林卓午、叶仁灏、张国桢等人作陪。宴毕，周副主席要回八路军办事处了，西密司、林卓午以及全体职工涌向大门口欢送，汽车发动了，又一次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周副主席半身伸出车窗向大家挥手告别，职工们翘首目送，直到汽车离开了人们的视野，大家才带着兴奋喜悦的面容走回了宋家花园。

* * *

后记：这已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聆听过周副主席这次时事讲话的邮局职工，大都离开了人间。我在同志们的鼓励下，曾多次给北京邮局退休干部张连朴同志写信转问现已八十四高龄的张国桢同志核对了当时的情况，写成了这篇回忆资料，希望聆听过周副主席时事讲话的同志加以补充和指正。

朱德同志在西安「八办」

谭冰

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一整套反动的“溶共”“防共”“限共”的具体反动政策。继而发动

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指示其反共爪牙制造了平江、确山、贵阳等事件；同时又抽调国民党抗日前线的部队，包围和封锁陕甘宁边区；公开指使河北省的张荫梧，山西省的阎锡山等部队进攻在敌后抗日的八路军。这时，八路军总司令朱德

同志为了争取抗战胜利，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冲破日寇的重重封锁，由抗日前线的太行山路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返回延安，同毛主席商量对日、对蒋的决策。

（一）

正是初春季节，朱总司令来到办事处。他不顾战场上和路途上的疲劳，就给办事处的同志们和赴延安的青年作《敌后形势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报告，增强了同志们抗日必胜的信心。同时多次会见西安地区救亡团体的负责人和各民主党派人士，如杜斌丞、杨明轩等。也会见过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如胡宗南、程潜、蒋鼎文等，同他们进行了谈判斗争。

办事处的同志们看到我们敬爱的朱总司令日夜奔忙、辛勤工作，身上却穿着一身破旧的补了又补的单薄军衣，心里很过意不去。办事处处长伍云甫同志考虑到朱老总经常会见

外界人士和国民党上层人物，决定给他做一身新的军衣，但被朱老总谢绝了。他说“前方战士整天和日本鬼子打仗，吃饭睡觉都顾不上，我的衣服破点儿算什么？”伍处长看这样劝说行，他灵机一动又说：

“你常教育我们办事处的同志，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要注意军容风纪，要时刻想着自己是代表整个八路军的，那么您是我们八路军的总司令，每天都要和国民党的上层人物打交道，不更要应该注意自己的军容风纪吗？”一番话说得总司令笑了起来，只好说：“啊，你还真会做思想工作。”就这样，我们的处长马上叫人请了一名裁剪工，连夜做了一套新军装，用的是很普通的布。我们的总司令领到这套军装后，并不是每天都穿，而是只有在外出和会见各方面人士时才穿一会儿，回来后，很快就脱下来，叠得整整齐齐的放在自己

的床头上，而平时仍然穿着破旧的军装。

(二)

朱总司令在办事处期间，除了紧张繁忙的工作外，总要挤出一定的时间参加体育活动。当时我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和全国各地来的青年学生在门前一块空地上开辟了一个篮球场。晚饭后，大家都喜欢去球场活动活动。由于人多，大家只好排队轮换着打，我们的朱老总非常喜欢打球，但每次他都和大家一样的排队，从来不以首长的姿态出现。轮到他上场时，同志们出于爱护和尊敬的心情，都不去抢他手里的球，为了使他能多打一会儿。总司令发现后，就假装生气地对大家说：“这样多不好，你们都不抢，就我一个老头子抱着球满场跑，多没有意思。咱们都是为了锻炼身体，在场上都是平等的运动员，没有总司

令”。总司令当即下命令叫大家和他抢球。大家看到我们的总司令是这样平易近人，也就你争我抢的上前去夺总司令手里的球。顿时，球场上出现了一派热烈的气氛。

(三)

总司令的衣服从来都是自己洗。他来办事处的第二天中午，怕吵醒午睡的同志，就在办事处院内水井边的一个角落里洗衣服。当时被我和另一个

警卫员看到了，我们心里很不安，就跑到跟前要替他打水洗衣服，总司令说：“小鬼，不用麻烦你们了，我马上就洗完了，你们还是去休息一会儿吧”。我们的总司令统帅着千军万马，在战场上对敌人是那样的严肃、果断，但对自己的同志，无论是炊事员还是马伕，都是那样的和蔼可亲、平等待人。他那慈祥的目光，平易近人的笑容，使我至今难忘。

党在一战时期的 军事工作片段

——记马云泽同志的一次谈话

郭 润 宇

我曾有机会访问了马云泽同志。马老答允了我的请求，略予回思，便侃侃谈起大革命时期他在冯玉祥部队里的一段革命历程：

“一九二六年前，我在绥德义和镇小学上学，家境贫寒，倾向革命，进而从事革命活动，担任了国民党的区分部委员，并与陕北绥德第四师范共产党和共青团的组织有了联系。

大革命初期，绥德的共产党组织只有几个党员，当时要选派人去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本来想让我去，因我正在上学，没有去。结果共产党员刘志丹等同志去了黄埔军官学校（刘从黄埔军官学校毕业回来后，在冯玉祥所辖马鸿逵部任少将政治处长），另外几个同志去了农民运动讲习所。一九二六年，绥德的共产党组织又先后派了两批进步学生（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去冯玉祥部做军事政治工作。第一批是随同由华北去兰州报考冯玉祥办的军事政治训练班路过陕北的共产党员钱弁泉同志走的，其中有安子文、李林民等（李路过银川市就留在那里搞党的工作）。第二批于同年十一月间，随同由华北去兰州的共

产党员徐梦周（后脱党）走的，其中有白雪山、张慕时（佳县人）马承琪、常宣、崔仲英（米脂人，后脱党）、张志文、（佳县人，后脱党）、李秉荣和我共八人。

出发时，我和李秉荣还不是共产党员，经过长途跋涉，对我们锻炼很大。路上，我们向群众宣传革命的道理，组织农民协会；白雪山等同志又组织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提高了革命觉悟，使我们对马列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到宁夏银川市，我们暂时住在宁夏党组织的所在地——四鼓楼，经白雪山和张慕时介绍，我和李秉荣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银川，经徐梦周与宁夏党组织的负责人李林民联系后，决定我们不再去兰州，就地安排。当时，我们中党令较长的马承琪、常宣被派往冯玉祥所辖吉鸿昌部的特别党部工作，其他六人则被组织指派，考入冯玉祥的随营军官学校（马承琪和常宣后来也去了）。该校先设在陇东平凉，后于一九二七年初搬到了西安东羊市原军装局内，更名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革命军事政治学校。到该校后，我和白雪山、李秉荣被分到机关枪队；张慕时、崔仲英、张志文被分到骑兵团。

我们在该校的具体事情是充当“整理笔记委员”。冯玉祥不给学生发书，只发铅笔和笔记本。教官讲课时，笔记委员坐在近傍纪录。到晚上，几个笔记委员聚在一起核对、整理笔记，并抄写在本队教室的黑板上，再让同学们抄。每队的笔记委员都是共产党员。

起初，该校校长是王文彬。他原是冯玉祥手下的一个旅长，把学校搞得死气沉沉。后来，由续范亭担任校长，学校气氛就变了，他领导同学们读进步书，唱《国际歌》……，革命空气很浓。

该校的政治部主任是唐澍，政治教官有：苏联的乌斯曼诺夫，讲俄国革命史，汪泽杰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唐澍也兼课，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学们都叫唐澍“托拉斯”、“辛迪加”，他一笑置之。当时为了在群众中鼓动革命，学校组织了一个红色话剧团，唐澍任团长，我和白雪山都积极参加了。一九二七年春，正是大革命高潮时期，群众斗争情绪非常高昂，学校的共产党员经常利用早操最后一段时间上街搞宣传。由于白雪山同志工作成绩显著，四月间冯玉祥调他到总政治部工作，并请他吃了一顿“革命饭”——稀饭、馒头、黄萝卜丝。这一年“五·一”节红色话剧团在易俗社剧院演了一场《孔雀东南飞》。我当时扮演了个老婆。在这前后，红色话剧团还多次在校内演出。

那时，该校共有三十几个共产党员。党员开会，一般是晚上在校外开。

一九二七年五月，冯玉祥东出潼关参加北伐，总政治部主任是刘伯坚。刘伯坚提议，并经冯玉祥同意，将军事学校的共产党员全部调离学校，组织了一个前敌政治工作团，随军北伐。白雪山也被调到该团工作。工作团团长简又文是个民主人士，曾任某大学校长，比较进步，副团长黄沙谷，却是个CC分子。团部委员有荣志卿（共产党员）等人。当时，冯玉祥的行营设在潼关，他派汽车把前敌政治工作团的全体人员接到那里，逐个问了每个人的情况，然后讲了工作方法。冯讲后，刘伯坚也讲了话。

前敌政治工作人员赶往前线，先从潼关坐船到陕县，上岸后沿铁路向东步行，边走边宣传。工作团在豫西陇海铁路段工作期间，在第三路军担任少将政治处长的宣侠父同志（浙江奉化人，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学生），临时兼任这个团宣传队队长。我当

时是这个队的宣传员（尉官）。

到了渑池正式参加北伐，继续行军到洛阳，这时突然接到通知，要前敌政治工作团的全体人员赶快上火车，说从武汉上来的北伐军已克复郑州，要求去那里会师。到了郑州，前敌政治工作团住在基督青年会内。

从武汉来的北伐军，主要有叶挺的部队和张发奎、唐生智的部队。他们的政治工作人员见了我们的面，先问冯部是否反对蒋介石？他们接着就向我们讲了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当时从南方来的北伐部队的宣传员都是骑着摩托车，手举一厚叠反蒋传单，让风吹撒；我们的政治工作团人员则是贴反对蒋介石的标语。当时，黄沙谷不让贴，说是总司令（指冯玉祥）没有命令。宣传员便和他辩论起来，言词非常激烈。不几天，张发奎、唐生智、汪精卫、孙科等人来到郑州，给他们的全军政治工作人员讲话，我们前敌政治工作团的全体人员（百分之八十共产党员，不是共产党员的少数人也比较进步）也都去参加了。

会师后的一天，我们前敌政治工作团布置欢迎于右任、惠有光（原名惠思文），火车到后，却发现冯玉祥也来了。冯从铁门车上下来后穿着士兵服，背着雨伞，立即召集前敌政治工作团全体工作人员开会讲话，他说什么共产党犯了错误，又说什么战士在前方打仗，他们的家却被共产党领导的贫农团给抄了。我们军官的父亲是富农，抽大烟，贫农团给把烟灯端了。这就象演戏，演员和乐器配合不起来，怎么能行？会后就下令逮捕了荣志卿，并宣布停止前敌政治工作团全体人员的工作。大家听了，觉得天又变了，横竖目前没有事干，就整天看马列主义的书。

五月端午前后，李达同志突然来了。他是化装成商人秘密来